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先秦诸子系年

(外一种)

钱 穆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先秦诸子系年

(外一种)

钱 穆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诸子系年:外一种/钱穆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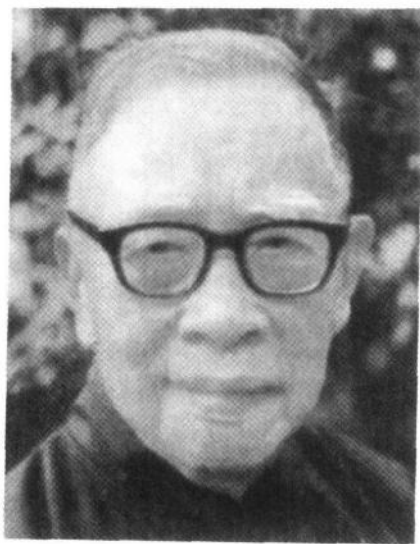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ISBN 7-5434-4427-5

I. 先… II. 钱… III. ①哲学家-年谱-中国-先秦时代 ②刘向-年谱
③刘歆-年谱 IV. B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2271 号

书 名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先秦诸子系年(外一种)
作 者	钱 穆
责任编辑	张惠芝 杨子江
装帧设计	慈立群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45 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0.25
字 数	671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427-5/K·184
定 价	39.3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錢穆(1895~1990)字賓四。江蘇無錫人。1912年輟學後自學，任教于中小學。1930年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被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后歷任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教授。抗日戰爭時期，先后在西南聯合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齊魯大學任教。抗日戰爭勝利后，先后任昆明五華書院文史研究所所長、無錫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1949年去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任院長。1967年移居臺北，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所教授和博士生班首任班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臺北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著作輯為《錢賓四先生全集》，凡甲、乙、丙三編，計五十六種五十四冊約一千七百萬字。

◎先秦諸子繫年(外一種)

HAD 51

出版說明

20 世紀是中國史學發展最顯著、變革最深刻的時期。新時代、新史觀、新史料、新方法、新的學術文化氛圍等等，造就了 20 世紀的中國史學。

20 世紀中國史學，大家輩出，學派林立，名著累累，異彩紛呈，在中國史學發展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現在的中國史學和未來的中國史學都得力于并將繼續得力于先賢的這些努力；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產生和發展，代表了中國史學發展的前進方向。

20 世紀中國史學，是中國歷史學家研究成果在學術文化上的一個重要的反映，成為時代的宏偉紀錄；同時，它又反作用于前者，在促進社會變革與革命、增強愛國主義、加強民族團結、推動社會進步、提高民族素質、增益人們智慧等方面，一直發揮着積極的作用。

20 世紀中國史學，是 20 世紀世界史學的一個重要部分。如果說 20 世紀的外國史學對 20 世紀的中國史學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的話，那麼，近幾十年來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史學也在逐步擴大它對外國史學發展的影響。這種雙向的

交流和影響，必將有利于推動世界史學的進一步發展。

在世紀之交，編輯、出版《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是對百年史學名著的整理和總結，是尊重它們在史學上的成就和史學史上的地位，也是為后人學習、研究 20 世紀中國史學優秀遺產提供方便，是學術文化積累的基礎工程。同時，這個工程也為外國學者進一步了解 20 世紀中國史學提供方便。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套書也可看作是向世界展示 20 世紀中國史學的一個學術長廊。

本社有志于從事這一尊重前人、裨益今人、嘉惠后人的文化出版工程。目的是推動中國史學事業的繁榮和發展、促進中外史學交流。我們在史學界諸多專家學者的支持下，決定編輯、出版《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這一工程繁重浩大，工作煩瑣，限于我們的識見和能力，舛誤紕繆在所難免，敬祈方家和廣大讀者不吝指正。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

編校凡例

一、編選範圍。《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編選 20 世紀出版的、對當時史學發展或對其后史學發展產生過重大作用和重大影響，即在 20 世紀中國史學發展上占有重要地位者。專著、論集，一視同仁；名著、名篇，皆所珍惜。範圍既廣，其工甚巨，故先期編選部分已辭世的史學家的名著。

二、版本與編次。盡量選擇好的底本，即作者的修訂本或校閱本，精心編校，自成一卷。每卷冠有作者照片、小傳、書影、手迹等。書首有總序，繼之為目錄、前言、正文，正文后或有附錄，書末以作者著述要目為殿。原著按舊式提行分段者，改為現在通行的分段形式。獨立成段的引文變換字體縮格排印。原著用文末注者，改為頁下脚注；雙行夾注改為單行小字夾注；夾注首尾原用括號者，一般刪去括號；注文自成單元。

三、編校原則。除版式與必要的技術性處理外，原著的內容及結構，一仍其舊，以存文本原貌。

四、規範用字。改異體字為正體字，改繁體字為簡化字，原則上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12月22日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1986年10月10日重新發表的《簡化字總表》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國家教育委員會1988年1月26日發布的《現代漢語通用字表》為準。凡屬繁體字與簡化字一對一者，均用簡化字，如趙與𧯛、興與𧯞等；如系多對一者或多音多義字，則根據情況區別對待，如乾、幹與干等。對於姓名、地名、書名等專用名詞，如用正體字、簡化字容易產生歧義者，則保留原來的文字形體，如文徵明不改為文征明，鬍縣不改為戶縣，《淮南子·汜論訓》不改為《淮南子·泛論訓》等。通假字、古今字、省形字等均保留原貌。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語言，每個作者都有其慣用字詞，凡有根據者則不改為現在通行的字詞。

五、標點符號。凡豎排、無標點或用舊式句讀者，除個別有特殊要求者或限于目前的技術條件無法排印者外，一律改為橫排、新式標點。標點符號的使用，以1996年6月1日起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標點符號用法》為準。原著有專名（如人名、地名等）號者，均予省略；如專名號所標為并列關係且非集合詞語者，其間加頓號以便區別。書名號一律用規範形式（《 》、〈 〉，外文書名排斜體），原著無書名號或書名號不規範、不完整者，一律補加或改正。

六、校改錯訛。原著多為流傳已久的名著，對其文字一般不作改動。但確屬錯訛者，在所當改；一般筆畫之誤，魯魚淆舛，顯系誤寫錯排者，徑改不出校記。前人引書，常有省略略減或個別詞語的更動，只要不失原意，則不以所引書改動引文。確需校改增刪之處，用尖括號（< >）括住的字詞，表示刪去；用方括號〔 〕括住的字詞，表示改正；用

六角括號(〔 〕)括住的字詞，表示增補。對校改增刪者，一般加圈碼右上角注注號(①、②、③……)，并在同頁腳注中說明校改增刪理由及根據，其后用“校者注”字樣與原著注釋加以區分。

七、殘缺處理。原著中因字迹模糊或紙頁殘缺而致無法辨認，又無其他版本可據以核查者，根據所缺字數用“□”表示；所缺字數無法確定者，用“(下缺)”表示。

八、數字用法。一般保留原著的用法。如同一部書或同一卷書數字用法不一致時，一律用漢字表示。

總 序

戴 逸

20世紀即將過去，21世紀即將到來。回顧過去一個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它經歷了曲折崎嶇的路程，也取得了偉大豐厚的成績。這一百年內產生了不少杰出的歷史學家，像王國維、梁啟超、陳垣、陳寅恪、胡適、顧頡剛、錢穆、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等等，這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情況。杰出的歷史學家，一百年出不了幾個。兩千多年前出現了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司馬遷死后一百多年，產生了班固；班固死后五十多年產生了荀悅；又過了八十多年產生了陳壽。11世紀產生了歐陽修和司馬光及其助手劉恕、劉攽與範祖禹，12世紀產生了鄭樵。18世紀歷史學家比較多，像趙翼、錢大昕、王鴻盛、全祖望、章學誠，等等。20世紀的歷史學家就更多了，代表作也比較多。最重要的是

20世紀前期完成了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的過渡。同時，20世紀發現的史料大大促進了本世紀史學的發展，這也是過去所沒有的。漢代在孔壁里發現了《古文尚書》，西晉時在戰國魏墓中發現了《竹書紀年》，這在學術史上均可大書特書。但在古代，這種重大發現數量不算多，時間間隔也很長。20世紀史料的發現是過去任何時代不能相比的，是大批的、連續的、重大的發現；從古到今都有，極為豐富。一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現了甲骨文，還有金文即鐘鼎文（金石文字從宋以後已有不少發現），產生了王國維、羅振玉、李濟、郭沫若、董作賓、胡厚宣等一大批研究專家。如果沒有甲骨文、金文的發現，他們的成績就不會那麼大。二是帛書和簡牘的發現。長沙馬王堆帛書和山東臨沂、湖北雲夢、甘肅居延等地簡牘的出土，對先秦史和秦漢史研究具有重大意義，由此產生了勞幹等研究專家。三是敦煌文書的發現，促進了魏晉南北朝、隋唐以及宋、西夏歷史研究的深入，豐富了中國歷史的內容，產生出陳寅恪、常書鴻、唐長孺等一大批學者。四是外文材料以及少數民族文字如蒙古文、滿文史料的發掘利用，擴大了中國歷史學的研究範圍，產生出陳垣、馮承鈞、韓儒林、向達等一批蒙元史、中外交通史以及世界史研究專家。五是明清檔案的開放使用。這部分材料極其豐富，有上千萬件，有的一件材料就能裝一汽車，管理這批檔案的工作人員就多達二百人；研究專家則有孟森、鄭天挺、王鍾翰等。有的學者非常重視史料，例如傅斯年說史料就是史學。這個說法不一定很合適，但是強調史料的重要，也有它的合理性。有的專家窮年累月，勞精費神，一輩子搞史料，這也是對史學的貢獻，不能因為他專搞史料，就說他不是史學家。史料研究是

關係到歷史學盛衰的非常重要的問題。

回顧 20 世紀中國歷史學，可以概括出它的三個主要特點。

第一，進化史觀的引進。這是 20 世紀歷史學的顯著標志。自從嚴復翻譯了《天演論》，社會進化學說風靡全中國，中國近代學術均奉之為圭臬。在此以前的史學，可以劃到傳統史學里去。20 世紀初，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新史學》，夏曾佑著《中國古代史》，提出“史界革命”，顯然是受到西方的影響，提倡以進化史觀為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中國傳統史學有一種影響很大的歷史觀念，認為社會歷史越古越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中國的道統，他們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新史學”顯然不同，主張歷史是進步的。今文學派和康有為的思想中已經有進化史觀的因素，但更明確地提出系統的進化觀點的則是梁啟超。他認為不進行史界革命，中國就沒有出路。他說：“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中國之舊史》）以後的歷史學家，包括王國維、陳寅恪、陳垣、胡適、傅斯年等人，都具有進化史觀。進化史觀不但認為歷史是進步的，同時還強調歷史的因果關係。梁啟超就曾經反復強調過這一點。五四運動對傳統的批判，是建立在進化史觀基礎之上的。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古史”觀，實際上是進化史觀走到極端的產物。他提出了疑古辨偽思想，認為上古時代不僅不是進步的，而且儒家宣揚的那種黃金時代，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當時懷疑古書、否定古史的風氣非常盛行。這種疑古觀念有它的片面性，但在廓清古史迷霧方面，它是有貢獻的。古代確實有很多傳說的東西，不可深信，但也不

可完全丟棄，傳說中包含着歷史真實的顆粒。顧頡剛等通過辨偽祛疑，還歷史真實面目，功勞很大，不可磨滅。

第二，唯物史觀的學習和運用。這是20世紀中國史學的偉大進步。20年代以後傳入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唯物史觀相對於進化論來說，是更高層次上的理論，它承認進化史觀，包含了進化史觀的合理內核。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受達爾文學說影響產生的。那麼，唯物史觀給史學增加了什麼新內容呢？一是唯物史觀在承認歷史是進步的、具有因果關係的同時，明確提出客觀世界是被規律所制約的，歷史發展具有規律性。當然，在承認這一點的時候，我們要牢牢記住，社會歷史和自然界不一樣。社會有人參與，有主觀參與，內容更加複雜。歷史規律不像自然界規律那樣單純，而是摻進了人的活動，通過偶然來實現必然，所以對歷史的研究更加複雜。但歷史規律是客觀的，不是主觀的。這一點不僅與唯心史觀不同，與進化史觀也是不同的。後來出現的弊端是把社會歷史和自然界一樣看待，過分強調規律，陷入了機械唯物論。二是承認歷史是前進的，歷史前進的決定性因素是生產力的發展、生產方式的發展，是經濟原因。歷史發展是許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並不僅僅是經濟在其中起作用，如果單純強調經濟的決定作用，又會陷入簡單的經濟決定論。要重視歷史發展中多種複雜因素的相互作用。不重視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軍事的、地理的種種因素，在歷史研究中就不能前進一步。因此，唯物史觀一方面區別於唯心史觀那種把英雄人物或思想、政治和上層建築視為歷史發展決定因素的觀點，另一方面也區別於機械唯物論不承認其他因素起作用的觀點。我們承認經濟因素在歷史發展中起最重要的作用，

這是唯物史觀給我們認識上增加的新內容。三是唯物史觀把階級鬥爭看做階級社會前進的動力。馬克思主義反覆強調，階級存在於社會統一體內，各階級之間既有矛盾對立，又相互統一，不能把社會看成僅僅是階級之間的鬥爭。把階級鬥爭絕對化，“以階級鬥爭為綱”，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在20世紀，唯物史觀對中國史學發展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無論馬克思主義者，還是非馬克思主義者，都必須承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中國學術的巨大影響，這是事實。同時也要承認，唯物史觀與傳統史學及進化史觀雖然不同，但並非與之絕對對立，而是吸收了傳統史學的精華，認同於進化史觀而更加科學化了。過去我們往往把它們對立起來，應該汲取這個教訓。

第三，理性精神的張揚，或曰理性的發醒。所謂理性精神，就是承認人具有正確認知客觀歷史的能力。這是相對於蒙昧主義和宗教思想認為世界是不可知的、是由超自然力量主宰的觀點而言的，也是相對於僅憑主觀感悟認知世界而言的。理性精神是用人的心智來分析、論證、解釋歷史，依靠理性的推導、邏輯的證明，歸納演繹出結論，而不是按照超自然力量的啓示、按照人的直觀感悟理解歷史。一旦離開理性，就無法正確認識任何歷史問題。過去乾嘉學派頗有一點近代的理性精神。他們以“實事求是”作為治學宗旨，重視證據，無征不信，不受權威影響，有獨立的研究精神，即使對《尚書》這樣權威性的古書也不迷信不盲從。這種理性精神，是傳統史學留給我們的一份珍貴遺產。中國傳統史學的具體成果是很多的，但如果從中國傳統認知方式來看，我感覺中國的思想認識方式還是一種直觀的感悟，有點像佛教禪

宗的頓悟。宋明理學是用直觀方法，從整體上把握認知對象；而乾嘉學派是從具體方面分析、歸納、演繹，從而達到理性認識。這是兩種不同的認知方法。中國傳統中感悟式認知方法比較發達，而理性方面的認識比較少。當然，在后來的著作中，如司馬光撰《資治通鑒考異》，也有這方面的因素。考證學也有這種理性因素，事實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這種認知方法更接近于近代科學認識方法。近代科學是把對象獨立起來進行研究，排除外部干擾，在實驗室里通過實驗得出結論。我覺得 20 世紀 20 年代的科學與玄學之爭，就是這兩種認知方法的不同路徑，是理性分析與直觀感悟之爭。玄學也不是胡說八道，也有它的道理。胡適他們主張科學，更具有理性精神。中國近代的實證史學觀，如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胡適的“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一方面繼承了乾嘉學派的治學路數，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的科學方法。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的著作，20 年代有李大釗的《史學要論》。研究成績最大、起步最早的當推郭沫若，他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不論現在看來有什麼缺點，却是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歷史的開山之作。以后，呂振羽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方面最早提出西周封建說。中國歷史學在突破傳統以后，沒過多久就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盡管當時李大釗、郭沫若以及后來的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等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理論上尚未成熟，研究成果難免有粗糙之處，但這時的歷史學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既和傳統史學不同，也和近代實證史學不同。這裡有一個問題值得探討，即馬克思主義史學和實證主義史學是什麼關係。馬克思主義史學實際上吸收了實證主義史學的優點，比如進

化史觀、理性精神，還有愛國主義，並進一步加以發展，而摒棄了它的不足。馬克思主義史學高出於實證史學，更加科學，但又繼承了後者的優點。過去常常用資產階級史學家和無產階級史學家區分兩代史學家，用階級屬性看待一個學者、一種學術，這並不科學。階級是由經濟、政治等社會地位決定的，知識領域里的階級劃分要複雜得多。很多知識帶有普遍真理的性質，各階級都可以接受。自然科學沒有階級屬性，不存在資產階級物理學、無產階級物理學。社會科學有所不同，在世界觀、歷史觀上可以判斷階級屬性，但其中是否也有與自然科學相同的真理性的知識？歷史智慧任何階級都可以借鑒，不能說這是資產階級智慧，那是無產階級智慧。歷史提供的某種智慧，不是對一些階級適用，對另外的階級不適用。歷史智慧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人類的共同財富。把這種知識與智慧簡單地歸納為資產階級的或無產階級的，這種劃分方法很不妥當。有些知識超越時代，超越階級，是真理性的東西，對任何階級都適用。王國維的研究成果，我們至今還承認其價值。他有不足，我們可以補充，但他的研究結論，今天還是能夠站得住腳的；否則，就沒有歷史的繼承了。隨意把學者、學派和學術畫上階級符號從而確定其階級屬性的做法是有害的。因此，不應簡單地突出馬克思主義史學與實證主義史學的對立，而看不到他們之間的繼承性。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是在王國維、羅振玉研究的基礎上取得的，他很尊重他們的成果。範文瀾是黃侃的學生，而黃侃是章太炎的弟子，從經學起家，他們有這種學術上的傳承關係，不承認也不行。過去我們把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陳垣都孤立起來，實際上後人很多成果和方法都從他們那里繼承發展而

來。我們研究 20 世紀中國歷史學，應該看到這個事實。

歷史研究的對象是過去，而研究的目的却是認識今天。20 世紀一代又一代的歷史學家不斷地研究過去，重新認識傳統的中國，爲的是要更深入、更準確地認識今天中國的國情。我們可以把這一百年中國史學劃分爲四個階段，每一個階段都產生了一批歷史學家，他們之間，既有繼承，也有發展。

第一代史學家處於轉型時期，他們的使命是促使中國傳統史學轉向進化史觀與理性主義史學。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遭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國力衰弱，民族前途充滿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先進人士爲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必然要認識中國的過去，用新的觀點和方法重新審視中國的歷史。認識中國的過去，歸根結底是要認清中國的現實，尋找現實出路，創造未來。正像郭沫若所說的那樣：“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着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當時的社會變革使他們的認識產生了一次飛躍。中國傳統歷史學的成績很大，是豐富的極爲寶貴的史學遺產，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是封閉性。中國的古代雖然與世界有聯系，但非常少，所以當時中國人存在的觀念，就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其他民族和國家文明程度低下，沒有歷史。這樣一種理解，並不是某個人的缺點，而是整個時代的局限性。封閉的歷史觀，閉目塞聽，以致不能正確恰當地認識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處的地位。二是傳統史學中英雄史觀、個人史觀占主導地位。傳統史書突出記載帝王將相的活動，而對整個社會生活語焉不詳。三是傳統史學所反映的歷史內容，主要是政治史和軍事